

臺灣政治史研究的新趨勢 ——從抵抗權力到解構權力*

New Trends in Taiwanese Political History Research: From Resisting to Deconstructing Authority

陳翠蓮 (Chen Tsui-lien) **

一、臺灣政治史研究回顧

歷史學家 Eric Hobsbawm 說：「歷史做為國族主義者、種族主義者或基本教義派會加以運用的一種原始材料，正如同罌粟乃是海洛因的原料一般」；¹ 一語道破歷史與政治的關係。根據彭明輝的研究，他以 1945-2000 年臺灣各大專院校歷史相關系所學位論文所做為統計分析對象，分為臺灣史、中國史與世界史三大範圍，發現臺灣史學位論文只佔了總量的 15.9%，而中國史高達 73%，世界史也只有 11.1%；並且，臺灣史學位論文絕大多數是解嚴後才完成，解嚴之前臺灣史領域鮮少人敢去觸及，1990 年之後論文數量急速爆增。² 彭教授的統計分析說明臺灣史研究的重要現象，解嚴前，中國史是史學研究的正統，當時臺灣史研究乏人問津，顯然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

政治因素使得臺灣史研究遲遲不前，相對於國內的層層束縛，1980 年代以前臺灣史研究在海外較不受限制，因此得以捷足先登，並獲得一定成果。例如日本與美國先後有王育德、許世楷、陳以德的政治史研究；劉

進慶、涂照彥、陳玉璽的經濟史研究，陳隆志、彭明敏、戴天昭對於臺灣在國際法地位方面的研究，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 George H. Kerr 的《被出賣的臺灣》等等，都是較早期的成果。由於在日本與美國，臺灣研究本非學界主流，前述研究者能夠戮力從事臺灣研究，若非具有強烈政治意識，就是對臺灣處境特別關心者。

1987 年解嚴，對臺灣史研究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隨著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進程，學術界開始展現蓬勃活力。1990 年以來，臺灣研究熱鬧非凡，戴寶村教授戲稱臺灣史研究已從「險學」走向「顯學」。³

臺灣史研究在過去十幾年來大大躍進，在研究取向上究竟有何變化？張炎憲曾批評，解嚴前之臺灣史研究充斥著統治者史觀、中國中心主義與漢人中心主義三大偏見。⁴ 1990 年代以來口述歷史甚為流行，歷史學者熱衷於採集民間對二二八、白色恐怖等重要歷史事件的記憶與觀點，回憶錄、家族史、特殊世代或集體經驗的歷史書寫也不斷問世，可以視為庶民史開始受到重視的表徵。其次，曹永和院士所提出「臺灣島史」的主張，⁵ 無疑是對中國中心史觀的挑戰。而近年來原住民史、榮

* 本文依據 2008 年 12 月 4 日中研院臺史所舉辦的「2007 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所宣讀的論文修改而成。

**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1 Eric Hobsbawm, *On Histor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 5.

2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取向：一個計量史學的分析〉，收入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頁 151-206。

3 王韶君記錄，〈臺灣史研究與《臺灣史料研究》座談會〉，《臺灣史料研究》21（2003.9）：208。

4 多年前筆者在張炎憲教授的一篇文章看到這樣的意見，但文章篇名與出處尚未找到，此處依筆者記憶所及。

5 曹永和院士的「臺灣島史」概念於 1990 年代提出，主要觀點請參曹永和，〈海島臺灣的歷史視野〉，收入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編，《中華文化與臺灣文化：延續與斷裂》（臺北：政治大學文學院，2005），頁 V - IX。

民主、眷村史、女性史、新住民史的蓬勃發展，眾聲喧嘩，正揭示著多元族群觀點的到來。張炎憲所批判的三大偏見，正被一一克服中。

隨著臺灣社會的民主化，筆者發現臺灣政治史在研究主題與史料運用方面，也有些許變化。首先是研究主題從早年的荷治、明鄭，逐漸著重於日治，更有愈向當代推進的趨勢。以學位論文為例，施志汶統計自 1993 到 2002 十年間，國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共 1,040 篇，其中臺灣史碩士論文數量急速增加，遠遠超過過去四十年的總產量，共有 340 篇，佔全部論文數量的三分之一強。臺灣史論文中又以戰後史 124 篇，佔研究成果近四成，比例最高。碩士論文反映出的臺灣史研究趨勢是由近而遠，戰後史正是最受年輕研究者偏愛的範疇。同時，該統計也發現，戰後臺灣史碩士論文是以政治史為重心，其中又以反對運動與異議人士研究為主。⁶ 其次，過去政治史研究偏重「統治史 vs. 反抗史」的架構，例如清領時期的治臺政策與民變研究，日治時期有關日本統治當局殖民政策與臺灣人的武裝抗日、反殖民運動研究，是最受到青睞的主題，也累積了最多研究成果。例如，林玉茹等回顧 2000 年以前清治時期政治史研究成果以政策、制度與民變、械鬥為主；日治時期政治史研究成果集中在殖民統治政策、割臺之役與抗日運動等三個面向。⁷ 筆者認為，這種現象的發生與史料侷限有關，過去臺灣史研究大量依賴官方檔案，難以跳脫清廷檔案、總督府檔案中所記載官方觀點的限制；近年來有愈來愈多民間史料的發掘，口述史料、民間文書、日記書信等史料的出土，擴大了政治史研究的視野與詮釋角度，可說是臺灣政治史研究的第三個變化。

相較於林玉茹等人的整理，筆者發現 2007 年臺灣政治史研究成果，在方向上已有轉變，除了統治政策與

制度、抵抗運動面向以外，有關建構殖民知識與形塑國族認同的論文數量也相當可觀。經過討論，政治史中有關統治政策與制度部分由鍾淑敏教授負責，本文主要在討論有關抵抗、認同、知識建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二、抵抗與認同

2007 年臺灣政治史研究成果中，站在臺灣民眾史、庶民史立場出發，探討臺灣人在各個時代的集體思維、政治認同與抵抗行動者，仍是最重要的研究課題。

綜論性質方面，前《民眾日報》主筆邱國禎將其任該報所發表近三百篇臺灣史短文輯成的《近代臺灣慘史檔案》一書出版，⁸ 雖然不是學術性著作，但範圍從臺灣民主國、日治時期以迄戰後白色恐怖時期，內容包羅萬象，兼及民間傳說與相關人士口述訪問，是相當生動通俗的作品。林呈蓉的〈從日本的殖民統治談臺灣人「國家」意識的型塑〉，認為日治時期的文明體驗與近代教育的滲透，形成臺灣社會特有的常民文化、精神價值與公共意識，大異於其他華人社會。⁹ 陳君愷檢視日治時期成立的臺灣民眾黨，其眾多成員在戰後繼續反抗國民黨統治，此種反抗壓迫、追求公義的精神，不容被當代企圖「連結臺灣」的政黨支解利用、斷章取義。¹⁰ 江宜樺則將戰後臺灣政治思想區分為革命民主、自由主義、新儒家、左翼統派與臺灣民族主義五類，說明這些政治思想的主張內涵、起落發展，及與臺灣民主運動的關係。¹¹ 此外，若林正文的《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是 1983 年出版的舊作與 1984-1997 年間四篇論文的集合，由其門生翻譯為中文後出版，¹² 雖是舊作的譯本，但仍是日治臺灣史與臺灣民族主義研究方面不可忽略的重要作品。翁佳音的《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也是舊作

6 施志汶，〈近十年歷史研究所臺灣史碩士論文之考察（1993-2002）〉，《臺灣史料研究》21（2003.9）：54-87。

7 林玉茹、李毓中編，《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 1945-2000·臺灣史》（臺北：國科會人文研究中心，2004），頁 76、201-202。

8 邱國禎，《近代臺灣慘史檔案》（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

9 林呈蓉，〈從日本的殖民統治談臺灣人「國家」意識的型塑〉，《當代》237（2007.8）：24-36。

10 陳君愷，〈緬懷從「臺灣」與「民眾」出發的臺灣民眾黨〉，《當代》238（2007.9）：96-107。

11 江宜樺，〈臺灣戰後政治思想與民主運動〉，《臺灣社會研究》65（2007.3）：191-199。

12 若林正文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北：播種者出版社，2007）。

再版，針對武裝抗日運動提出經濟因素與宗教因素的詮釋，¹³ 在武裝抗日史久無新人新作的情况下，其說仍然獨領風騷。

其次，透過史料發掘耙梳重新探索或詮釋日治到戰後臺灣人抵抗行動的相關研究，成果堪稱豐碩。日治統治，有陳俊宏由諸多史料與民間傳說討論臺灣民主國相關小說中虛虛實實的歷史，是通俗可親之作。¹⁴ 陳景峰以口述訪問為主，檢視曾文農民組合農民運動與地方菁英、農民抗爭活動的性格與模式，支持前行研究者所提出日治時期農民運動由地方菁英領導、其興衰取決於經濟理性看法。¹⁵ 鄭志敏以紮實的史料為依據，分析 1920 年代官方任命的高雄市街協議會員與 1935 與 1939 兩次選舉產生的高雄市會議員的背景差異、官派與民選議員對社會流動的影響，及日治時期地方自治經驗對戰後政治的影響。¹⁶ 王政文重新梳理國民黨黨史會等相關史料，以李友邦的臺灣義勇隊為主，探討日治末期臺灣人抗日團體在中國大陸的活動，¹⁷ 但就使用之史料與認同等問題的探討上，並未超出前人的研究成果。戰後方面，曾文亮、王泰升詳實地整理出日治時期受法律教育的菁英人才，並從政治、專業與法學教育三個領域呈現臺灣在地法律人才在戰後初期被排拒、否定的遭遇，具體說明臺灣菁英在戰後政權變動中的不堪處境。¹⁸ 陳翠蓮從政

治與文化兩個面向，將戰後初期臺灣人的祖國體驗定義為「再殖民經驗」，並檢視此經驗對臺灣人國族認同的衝擊。¹⁹ 蘇瑤崇依據鈴木茂夫所搜集的臺灣總督府在臺統治最後文書等史料作翻案文章，指戰敗之初日本政府仍有良好統治能力維持臺灣治安，欲推翻吳濁流所提「政治真空期」臺灣人自律自制之說；又認為辜振甫等人的獨立運動是自發行動，並非日本少壯軍人煽動等等，²⁰ 文中雖屢有驚人之語，卻不無獨信日人資料之偏。湯熙勇從外交部檔案著手，探討戰後初期海外臺灣人返鄉問題與日本等東亞地區臺灣同鄉會的角色；²¹ 也對甚少被研究的 1946 年澀谷事件的發生背景與審判過程，做了完整清晰的鋪陳。²² 侯坤宏以諸多口述史述史料與回憶錄呈現白色恐怖時期天羅地網無所不在的情形；²³ 陳儀深藉由新公開的外交部檔案梳理彭明敏事件始末及與海外臺獨運動的關係。²⁴ 廖珮涵整理美麗島事件後黨外人士歷次選舉動的競選傳單，呈現臺灣民主運動從谷底的悲情自抑，歷經整裝振作，終能走出陰霾、標舉理想的過程。²⁵ 陳佳宏則敘述解嚴前後臺灣島內外的獨立運動匯聚、衝撞體制的過程，終於迫使刑法一百條「思想叛亂」修正，使臺獨言論除罪化、黑名單牢籠瓦解，臺獨運動得到更寬廣的發展空間。²⁶ 吳叡人則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另闢蹊徑，以 Isaiah Berlin 的「積極自由」與「消極

13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

14 陳俊宏，〈歷史小說中的臺灣民主國〉，《臺北文獻》161（2007.9）：95-152。

15 陳景峰，〈「曾文農組合」中領導分子的角色探討〉，《臺灣風物》57:1（2007.3）：143-164。

16 鄭志敏，〈日治時期高雄市臺籍人士地方自治參與之研究〉，《高市文獻》20:1（2007.3）：58-153。

17 王政文，《臺灣義勇隊——臺灣抗日團體在大陸的活動（1937-1945）》（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7）。

18 曾文亮、王泰升，〈被併吞的滋味——戰後初期臺灣在地法律人才的處境與遭遇〉，收入薛月順編，《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7），頁 273-332。

19 陳翠蓮，〈戰後初期臺灣人的認同轉變〉，《兩岸發展史研究》4（2007.12）：81-124。

20 蘇瑤崇，〈從「終戰」到「光復」期間臺灣政治與社會變化〉，《國史館學術集刊》13（2007.9）：45-87。

21 湯熙勇，〈烽火後的同鄉情——戰後東亞臺灣同鄉會的成立、轉變與角色（1945-1948）〉，《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9:1（2007.3）：1-50。

22 湯熙勇，〈公平對待與秩序維持之間——日本東京澀谷事件對臺灣人的審判（1946-47）〉，《亞太研究論壇》35（2007.3）：1-35。

23 侯坤宏，〈戰後臺灣白色恐怖論析〉，《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177-219。

24 陳儀深，〈彭明敏與海外臺獨運動（1964-1972）〉，《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221-241。

25 廖珮涵，〈選舉活動的傳單研究（1980-1990）〉，《臺灣史料研究》29（2007.4）：183-210。

26 陳佳宏，〈解嚴前後臺獨運動之匯聚〉，《臺灣文獻》58:4（2007.6）：1-40。

自由」兩種概念，分析日治時期政治運動與戰後「自由中國」集團的論述。²⁷

也有以文學作品進行文本分析，探討臺灣人政治認同議題者，如黃文鉅認為庄司總一小說《陳夫人》，充滿迎合皇民化的用心，難脫以官方民族主義宰制臺灣人的立場。²⁸ 莫素微反對以往視周金波〈志願兵〉為皇民化政策產物的看法，提出周金波以小說〈志願兵〉做為一公共論壇般，策略性地反映殖民地人民的人性思考、個人利益算計、對帝國作為與皇民價值的懷疑等面向，²⁹ 提供了深入、條理，令人眼睛一亮的分析。廖秋紅將多位臺灣作家的志願兵題材小說一併討論，認為不同案例與作品正顯示日治時期臺灣人身份認同的流動變異與多重層次的特質，進而批判研究者脫離歷史時空的主觀評斷，主張文學評論應超越民族道德為唯一審度標準，使文學作品回到美學與藝術成分的討論為主。³⁰ 荆子馨陳述各種西方文明現代性／殖民性關係之觀點，及歐洲中心主義與日本中心主義的帝國殖民權力後，指出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提供了一個從殖民地臺灣、被殖民者的位置出發，對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殖民主義的反論述。³¹

鎖定標竿人物為研究主題方面，如蔣渭水研究仍是熱門的題材。³² 而較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則有，蔡石山刻劃李登輝從「日本人」成為「中國人」，到覺醒為「臺灣人」的政治認同心路歷程，分析其心理折磨、待機求變、沉著堅忍的性格特質，褒貶其政治理念與政策施為；

並在分析李登輝的同時，間接論證了臺灣島民的性格。³³ 蘇瑞鏘運用「雷震、傅正檔案」完成傅正的傳記，除了敘述傅正生涯歷程與對臺灣民主運動的貢獻外，並對其不斷超越的人生格局、不斷突破種種藩籬的民主信念與認同選擇多所著墨。³⁴

三、政治權力與知識建構

解嚴以來，臺灣的學術研究也跟著擺脫束縛，不僅研究取向上愈呈多元，並且在論證上愈形犀利、具批判性。政治史研究也從人民抵抗統治壓迫的思想、論述或集體行動等主題，再進一步，透視政治權力如何藉由知識建構，改造人們的思想、信仰，形塑偉人崇拜與政治認同。從抵抗權力到解構權力，政治史研究可說是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2007 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上述的趨勢。節日、儀典的展演，是國家權力塑造集體認同的重要途徑，日治方面，辛德蘭探討日本政府如何在新屬地沖繩與臺灣安排皇室視察活動，如何透過盛大隆重的奉迎表演與迎送動員，來達到彰顯皇室權威與強化政治向心的目的，指出臺灣的皇室視察活動比沖繩更加熱烈、頻繁的原因在於，新附殖民地更需多方連結，以建構官民共享的歷史圖像。³⁵ 蔡錦堂追索「皇民化運動」如何由官報鼓吹與總督府當局順勢使力下形成；³⁶「紀元二千六百年」的神話與奉祝活動如何在戰爭時期盛大展開，並被利用為強

27 吳叡人，〈自由的兩個概念：戰前臺灣民族運動與戰後「自由中國」集團政治論述中關於「自由」之理念的初步比較〉，收入殷海光基金會編，《自由主義與新世紀臺灣》（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7），頁 55-105。

28 黃文鉅，〈官方民族主義與殖民地女性主體的失落——以庄司總一《陳夫人》為例〉，《臺灣文學評論》7:1（2007）：41-58。

29 莫素微，〈戰爭、同化與階級——周金波著〈志願兵〉與公民身分的追尋〉，《臺灣文學學報》10（2005.10）：131-161。

30 廖秋紅，〈日治末期臺灣人身份認同的演化進程——以臺籍作家的志願兵題材小說為中心（1941.6-1945.8）〉（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07）。

31 荆子馨，〈現代性／殖民性中的臺灣——亞細亞的孤兒及殖民差異〉，陳芳明編，《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臺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頁 360-373。

32 楊正彥，〈蔣渭水對臺灣民族運動之影響與貢獻〉（宜蘭：佛光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2007）。

33 蔡石山著，曾士榮、陳進盛譯，《李登輝與臺灣的國家認同》（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

34 蘇瑞鏘，《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

35 辛德蘭，〈近代日本王室的視察活動——沖繩與臺灣的比較研究（1891-1941）〉，收入辛德蘭編，《第十屆中疏歷史關係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中疏文化經濟協會，2007），頁 241-280。

36 蔡錦堂，〈再論「皇民化運動」〉，《淡江史學》18（2007.9）：227-245。

化國民認同的用途。³⁷ 戰後方面，如蔡佩娥追蹤「清明節」如何改爲「民族掃墓節」，又如何變成「蔣公逝世紀念日」，拆穿統治權力如何介入、利用民間習俗活動，暗渡國家民族觀念，甚至灌輸威權領袖崇拜。³⁸ 周俊宇的多篇論文，分別探討了威權統治時期黨、政、媒體聯手炮製爲蔣介石祝壽的現象與所形塑出的偉人形象；³⁹ 國家權力藉由過去歷史選擇性的再製與運用，將青年使命與國民黨歷史連結，使青年效忠於領袖個人；⁴⁰ 並比較戒嚴時期、解嚴後到政黨輪替前、政黨輪替後三個階段中，重要國定節日的改變，來說明國定節日如何成爲政治權力試圖掌控與創造的集體記憶場域。⁴¹

其次，近代國家透過教育，尤其是歷史教育，灌輸人民有關共同體的想像方式。教科書研究方面，戴寶村以戒嚴與解嚴之歷史爲焦點，比較了解嚴前後高中歷史教科書的敘述內容，除指出新舊教科書的主要變化，新版教科書有助於臺灣民主化歷史知識的增長外，也批評教科書改革幅度太小，對於形塑臺灣人集體記憶、彰顯轉型正義等方面的不足。⁴² 許毓峰分析依 1975 與 1993 年課程標準所編製的各版國小社會科教科書，竟然發現有關臺灣歷史知識的比例不增反減，從解嚴前修訂本的 46.67% 降爲解嚴後改編本的 18.64%；在歷史、地理、社會三方面所呈現的臺灣圖像則不甚合理，著重描述現代臺灣地理與社會，卻缺少歷史深度與集體情感。⁴³ 王郁德以蔣經國時代到李登輝時代臺灣中小學教科書中所

表現的國族主義變動，質疑民主化後雖然多元開放，但政治權力仍意圖隻手遮天壟斷教育，未能相互尊重妥協，創造彼此可以認同的價值觀。⁴⁴ 另外，李道緝探討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鄭彥棻主持下的僑委會如何將原本毫無關係的海外華僑與臺灣連結，形塑華僑對「新祖國」——臺灣的四海歸心，並分析了爲維持這種虛構的政治認同所付出僑團回國觀光、僑生回國升學、華僑回國投資等挹助與供養，所造成的不公與質疑。⁴⁵

也有諸多研究著手拆解做爲統治工具的傳播媒體與文化媒介。以下，依照研究主題的時間順序，謝侑恩以戰爭時期所拍攝的紀錄片《南進臺灣》爲焦點，說明日本總督府如何以電影形式爲表現手法，選擇性、目的地進行宣傳與說服，展示殖民統治政蹟、塑造國族認同並美化帝國擴張意圖。⁴⁶ 臺師大碩士生何力友透過戰後五年間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臺灣省政府等的出版品，析論當局從早期的「去日本化」、「中國化」與「政黨化」，轉變爲「反共」、「戡亂」。⁴⁷ 林果顯考察 1950 年代的廣播節目內容指出，中華民國政府已逐漸擺脫 1949 年風雨飄搖的危機，從硬性宣傳轉向軟性的、易親近的手法，利用生活情境與廣播劇等類型節目，將反共備戰等信念更細膩地深入人們日常生活中，成爲日後嚴密社會控制的基礎。⁴⁸ 張世瑛以 1950 年代「反共作家第一人」陳紀澄的小說《荻村傳》爲文本，拆解該小說的敘事結

37 蔡錦堂，〈「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師大臺灣史學報》1（2007.12）：51-88。

38 蔡佩娥，〈國家與民俗節日的關係——以清明節爲例〉，《臺灣風物》57:1（2007.3）：101-123。

39 周俊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蔣中正任臺時期的祝壽現象及其領袖形象塑造〉，《臺灣文獻》58:3（2007.9）：117-148。

40 周俊宇，〈「時代創造青年」——從戰後臺灣的青年節慶祝看國家權力對青年的形象塑造（1950-1975）〉，《臺灣學研究》4（2008.2）：24-42。

41 周俊宇，〈戒嚴、解嚴與集體記憶——以戰後臺灣的國定節日爲中心〉，《臺灣文獻》58:4（2007.12）：41-93。

42 戴寶村，〈解嚴歷史與歷史解嚴——高中歷史教科書內容的檢視〉，《臺灣文獻》58:4（2007.12）：399-425。

43 許毓峰，〈解嚴前後國小社會科教科書中的臺灣圖像〉（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

44 王郁德，〈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文化塑造——以教科書爲探討中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45 李道緝，〈建構新「祖國」——鄭彥棻時期的僑務工作〉，《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31（2007.7）：181-207。

46 謝侑恩，〈影像與國族建構——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日據時代影片《南進臺灣》爲例〉（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47 何力友，〈戰後初期臺灣官方出版品與黨國體制之構築（1945-1949）〉（臺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

48 林果顯，〈戰後日常生活中的反共知識建構——以《廣播雜誌》爲中心（1952-1956）〉，《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545-566。

構，探討其如何成為符合官方意識形態與反共文學的範本，並對該作品加以重新評價。⁴⁹ 陳康芬的博士論文更指出 1950 年代反共文學的傳布流行，是掌握政治權力的國民黨透過對文化社群的收編與合謀，所主導灌輸特定意識形態與文學類型發展的現象，也顯示政治與文學之間既對抗又協力的複雜權力關係。⁵⁰ 林麗雲則分析威權體制下三家無線電視台的資本形成，認為統治當局結合特定私人資本，藉由電視股份與資源分配，與黨政官僚、私人企業等發展出保護主與侍從的關係，並且在營利的驅力下，共享寡佔暴利。⁵¹ 陳佳宏認為美麗島事件前後國內主流平面媒體的報導，說明在當時臺灣社會所面臨的危機與變動中，人們需要「替罪羔羊」或「獵殺女巫」發洩集體的不安與不滿，在威權時期傳播媒體配合國民黨政府意圖下，美麗島事件正好淪為祭品，成為社會全體宣洩撻伐的出口。⁵²

政治權力利用文化媒材操控認同的現象，如果透過跨時代變動的對比映照，就更顯荒謬與無奈。陳美惠以官方檔案、田野調查、口述訪問等多種史料，探討 1895 伏見宮貞愛親王征臺時下榻之所臺南鹽水葉家八角樓在日治時期被總督府指定為史蹟名勝保護物件的榮耀，戰後政權轉移卻成為日本殖民印記的巨大變化，以及葉家子孫如何在不同政權下保全私產、面對歷史的過程，⁵³ 鮮明地呈現了政治權力操弄歷史遺跡的荒謬性，也透露了時代衝擊下常民堅韌的生命力。又，蔡錦堂也透過對老一輩臺灣人的問卷調查與口述訪問，並以蔡培火戰前親日與戰後親中的個案表現做為對比，說明跨越兩個政

權的老一輩臺灣人的日本觀受到時空因素極大的影響。隨著時代的轉變，他們心境複雜，不敢大聲說出他們對年輕時「日本母國」的觀感，隨著時間與時代調整他們的感想與說詞，已非親日 vs. 抗日、反抗 vs. 妥協所能概括。⁵⁴ 明尼蘇達大學教授 Joseph R. Allen 透過臺中公園等六處日治時期所遺留下的銅製神馬現狀的考察，指出神馬銅雕上紋飾的毀除、覆蓋所顯示國民黨政府對日本文化的仇恨與蔑視，而近年來銅馬的修復與複製，則與臺灣認同與政治意識的變化有密切的關連。⁵⁵ 李朝明的博士論文則從美學的角度，剖析蔣介石時期、蔣經國時期、李登輝前期與後期，如何從反共美學、現代主義美學、鄉土美學到主體美學的過渡、轉向、潛行與重構的過程，藉由美術與國族主義關係的反省，理解臺灣政治變遷與臺灣主體性意涵轉化的歷程。⁵⁶

四、從二二八研究到後二二八研究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二二八事件研究經過多年的發展，並未衰微，雖然不能說是日漸壯大，但仍舊在檔案史料上不斷有所突破，二二八論述與歷史詮釋成為研究重點。

2007 年為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多個機構召開二二八事件學術研討會，並從各自不同的研究面向，累積了可觀的研究成果。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合作，其研討會的重點在新史料的發現與運用，分為回顧與展望、史料發掘與運用、事件中的

49 張世瑛，〈1950 年代反共文學的敘事邏輯與文化政治——以陳紀澄《荻村傳》為例〉，《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567-596。

50 陳康芬，「政治意識形態、文學歷史與文學敘事——臺灣 50 年代反共文學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

51 林麗雲，〈威權主義下臺灣電視資本的形成〉，《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445-472。

52 陳佳宏，〈「美麗島大逮捕」前後國內輿論情勢之發展——以主流平面媒體為主的分析〉，《臺灣史研究》14:1 (2007.3): 191-230。

53 陳美惠，〈1895 年日本征臺遺跡：伏見宮貞愛親王之鹽水港御舍營所〉，《臺灣文獻》58:3 (2007.9): 223-264。

54 蔡錦堂，〈跨越日本與國民黨統治年代的臺灣人之日本觀〉，《臺灣文獻》58:3 (2007.9): 1-27。

55 Joseph R. Allen 著、楊美櫻譯，〈臺灣的神馬與意識型態〉，陳芳明編，《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臺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32-359。

56 李朝明，「臺灣國族論述與美術 1949-2000 —— 政治美學的觀點」（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校園、文學與二二八、原住民菁英的角色、外國人眼中的二二八等幾個主題，號召 20 多篇的論文，充分應用近年所新出土的各種史料。⁵⁷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規模較小，主題也較集中於二二八事件在高雄，如鄭志敏討論高雄地區醫生在事件中的受害的情形，許雪姬根據新史料比對，追究彭孟緝的責任問題、涂光明其人、情治人員的角色等問題，陳儀深則針對中研院院士黃彰健的二二八著作加以史料考證與評論；另有蘇瑤崇論中國報紙對事件的報導、翁嘉禧探討戰後初期經濟政策的特質與影響、陳芳明講述 42 條要求與戰後初期臺灣人自治主張之關係。⁵⁸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舉辦的研討會則著重於國際經驗比較與轉型正義探討，會議主題分為三個單元，其中「爭議與平反」單元，有陳儀深探討二二八事件的性質與定位、陳翠蓮分析二二八論述與歷史正義問題、翁金珠敘述二二八補償立法過程、張炎憲說明二二八事件平反與歷史意義等長期以來具爭議性的問題加以探討。又，「國際借鏡」單元以韓國光州事件、德國納粹屠殺、越南經驗、東德士兵射殺事件、奧地利經驗等例子，做為臺灣處理轉型正義問題的參考；「人權與法律」單元分別由國際人權、法律責任面向加以釐清，討論追究二二八責任的可能性。⁵⁹ 這些研究與討論已逐漸超越二二八事件本身或釐清歷史的層次，而進入「後二二八」的階段。

另一方面，2007 年有多篇以二二八為主題的碩博士學位論文產出，年輕一代的二二八研究，除少數史實探討之外，大多數也是以拆解權力運作為主要視角。東海大學碩士石育民重讀史料，欲為蔣渭川在二二八事件

中的角色翻案，⁶⁰ 但在史料上並未突破，辯護之說則同情多於論證，整體而言並不成功。政大新聞所廖崧傑考察二二八事件期間《臺灣新生報》的報導，指出該報在 1947 年 3 月 10 日停刊一日後，報導與言論立場幡然轉變，顯示國民黨政權開始全面控制臺灣媒體，日後更進一步以新聞媒體為工具進行黨國意識形態的霸權論述。⁶¹ 東海社會所顏世佩認為自 1987 年以來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口述歷史、自傳與回憶錄的撰寫、甚至是二二八紀念碑與紀念館的設置，都以歷史為名進行統獨論述與國族認同建構，質疑是否應背負過去的創傷來思考當下與未來。⁶² 東海大學中文所博士洪英雪則研究不同社會情勢下二二八小說，指出其從宰制到抵抗、集體失憶到恢復記憶、從質疑摸索到重建臺灣主體性的特性；她也認為歷史事件成為個人表達政治立場的工具，例如林雙不與曾健民的二二八文學，對比出不同政治認同的書寫與詮釋方式；另外，她也分析女性二二八小說的書寫，指出有解構男性為中心族群、國族、公領域書寫模式的效應。⁶³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臺灣社會尚有一部分人士對二二八事件提出特定詮釋。人間出版社出版的《2·28 六十周年特輯》收錄了當時的報導、當事人證言、文獻資料、人物剪影、文藝創作等，希望使人們對二二八事件「有全面而科學的認識」；並使「同族不再相仇，兩岸和解早日到來」。⁶⁴ 曾健民的《臺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二二八前的臺灣》，以戰後臺灣各種報紙與雜誌為主要史料，鋪陳出二二八事件前的 1946 年臺灣社會的各種面貌。⁶⁵ 這是繼 2005 年的《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臺灣》⁶⁶ 與《一九四五·光復新聲——臺灣光

57 許雪姬主編，《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文化局、臺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

58 許雪姬等著，《紀念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8）。

59 楊振隆編，《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權與轉型正義學述論文集》（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7）。

60 石育民，「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蔣渭川（1945-1947）」（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

61 廖崧傑，「二二八事件期間《臺灣新生報》的角色與作為分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62 顏世佩，「歷史書寫的政治：二二八事件真相的爭奪戰」（臺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63 洪英雪，「文學、歷史、政治與性別：二二八小說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

64 編輯部，〈2·28 六十周年特輯題解〉，收入陳映真總編輯，《2·28 六十周年特輯》（臺北：人間出版社，2007），頁 1-2。

65 曾健民，《臺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二二八前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2007）。

66 曾健民，《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臺灣》（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

復詩集》⁶⁷之後，曾健民的第三本二二八事件專書，他希望透過這些資料的整理，「可以窺見一點不同於我們現在的感情、思考和價值觀」。同時，中華基金會也於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的 2007 年出版了 5 本二二八事件專書，分別是張克輝的文學劇本《啊！謝雪紅》、藍博洲的《二二八野百合》、《青春戰鬥曲——二二八之後的臺北學運》、陳明忠的《二二八的另一個角落》與陳敏鳳、高凌雲合著的《二二八政治效應》。這套出版品雖然數量驚人，但內容多是舊史料的重新排列或摘錄，並無新的增長，有的書籍甚至可說是粗糙草率。但整體而言，這些團體與個人努力不懈地產出與發聲，除了反映了臺灣社會特定群體的觀點外，也顯現他們對於爭奪歷史詮釋權的執著與努力。

此外，尚有一介於學術與政治之間難以定位的作品。中央研究院院士黃彰健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全書達 584 頁之多，主要在考證史料真偽，為彭孟緝等人辯護；其中部分文稿是由黃彰健口述，他人整理，不能稱為嚴格的學術作品。黃彰健希望透過此書使二二八家屬明瞭事件真相，「減少其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怨恨，減少未來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阻力」。⁶⁸ 但就如陳儀深對黃彰健之作所評論，是「為辨偽而辨偽」、「察點滴之細而未見滔滔巨流」，⁶⁹ 許雪姬所評是「彭孟緝的化粧師」，⁷⁰ 大大減損了其做為學術著作的嚴謹性與說服力。

五、臺灣政治史的檢討與展望

整體而言，2007 年臺灣政治史研究成果可謂豐碩，並展現以下特色：

(一) 在研究取向上，跨越以往「統治史 vs. 反抗史」的格局，除了在史料的基礎上追究、釐清人民抵抗的歷史外，更進一步從「抵抗權力」的研究走向「解

構權力」的研究面向。從政治作用到文化滲透、儀典節日到文學美術，由四面八方、各種面向拆解、透視無所不在的權力運作。

(二) 各類人文社會學界研究者的投入，學科之間的區隔逐漸模糊，跨領域交流的情形，有強化臺灣政治史研究的縱深與理論化的作用；多元素材與研究新血的加入更使得政治史研究呈現多元蓬勃、生意盎然。

(三) 大量的社會科學理論、文學理論等跨學科理論借用。雖然史料發掘與史實釐清，仍佔不少份量，但借用社會科學理論進行歷史詮釋或文本分析漸有成為研究重點的趨勢。各種人文社會科學學科所發展出來的概念與理論先後被運用在歷史研究上，形成跨學科對話的活潑現象。

(四) 新近的研究漸能掙脫壓迫／抵抗、殖民／被殖、成功／失敗、愛國者／協力者……等二元對立的好惡判斷，更立體化與人性化地描摹、體會特定時空下的行動與抉擇。部分新生代研究者細膩、多層次、觀察入微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

但另一方面，政治史研究也出現瓶頸與隱憂：

(一) 年輕一輩研究者多選擇戰後史為主題，碩博士論文中此一趨勢尤為明顯，令人擔憂。至今，日治史尚見研究者努力呵護，清治、明鄭、乃至於荷治時期的研究不免有人才凋零之嘆，年輕一輩學者投注的關心相對而言甚為有限。此一現象之形成，除了研究者個人學術偏好的因素外，也有外在因素使然：2000 年民進黨執政以來加強史料公開，2002 年檔案法施行也催促戰後檔案史料相繼出土，各種題材與面向研究日盛，確實有利於戰後政治史的充實與擴展。其次，相對其他斷代研究須具備他國語文或古文能力等學術門檻，戰後史研究的語文門檻較低，也對部分研究者更有吸引力。

67 曾健民編著，《一九四五·光復新聲——臺灣光復詩集》（臺北：印刻出版公司，2005）。

68 黃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2007）。

69 陳儀深，〈為何考證？如何解讀？——評論黃彰健所著《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紀念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53-154。

70 許雪姬，〈高雄二二八事件真相再探〉，《紀念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12。

但是，年輕一輩研究者高度集中於戰後史研究，相形之下，荷治、清治與日治時期研究人才日減，臺灣史研究出現偏食現象，對整體臺灣史整體的健全發展，實是不能忽視的警訊。

(二) 近年來，跨學科研究成爲主流，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的借用相當流行。前文所指出大量的「知識建構」、「解構權力」等研究成果，大多借用了人文與社會科學相關理論。跨學科理論借用與對話的優點已如前述，但其中也有應加留意之處。近年來的臺灣政治史研究中，諸如集體記憶、國族主義、認同政治、權力論述、敘事策略、文化霸權、性別論述、後現代、後殖民、展演、語藝……等等概念與理論，諸多新穎奇巧者，也快速被借用，不免有追趕學術風潮的傾向。跨學科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可以肯定，但仍應持審慎態度，避免囫圇吞棗、浮誇獵奇之虞。

(三) 歷史學是否具有足以辨視的專業特性？是否應保持與其他人文學科的差別？這是值得思考再三的課題。從 2007 年政治史研究成果中，筆者也看到一個現象：歷史研究對於史料的掌握愈來愈不重視，而向論述能力傾斜，使得「以論代證」的情形愈來愈普遍。史學家 Marc Bloch 相當強調的「史家的技藝」之一——史料考證，⁷¹ 筆者認爲還是相當值得珍惜的能力。在人文研究幾乎是論述當道的今日，史料證據及立基於其上的論證，仍是史學研究者可以傲視於其他人文學科的特長。緣此，

筆者特別要向過去一年仍堅持在史料上矻矻鑽研，細心推論的研究者，表示最大的敬意。

(四) 做爲歷史研究者，有無應該被嚴格遵守的操守？這是另一個重要而嚴肅的問題。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暗示著「客觀事實」並不存在，歷史是人類主觀所建構，歷史的真實與虛構似乎越來越模糊。檢視 2007 年政治史的研究成果，筆者也發現部分研究者並非以追查歷史事實爲目標，反而選擇性地使用史料，用以支持個人主觀的政治信仰。學術研究與政治信仰間究竟應該存在著怎樣的關係？這也正是做爲政治史研究者之一的筆者，常常要面對的問題與試煉。

本文一開頭就引用 Hobsbawm 的看法，指陳政治與歷史的密切關係，及政治染指歷史的企圖。正因爲如此，一旦歷史研究者是一政治狂熱者，政治史研究將有淪爲政治宣傳品的危險。對於這個問題，Hobsbawm 也給了歷史學徒們這樣的提示：

……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必須忠於歷史事實，尤其要對政治意識形態濫用 (abuse) 歷史這件事提出批判。……對歷史學家而言，牢記自己的責任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要與政治認同所引起的激情劃清界線——即使我們時時感受到它……⁷²

藉著史學大師 Hobsbawm 的話，願與歷史學界的朋友們共勉。

71 布洛克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臺北：遠流出版社，1990），第三章。

72 Eric Hobsbawm, *On History*, pp. 6-8.